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及其演进

梅记周

【摘要】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内容可以概括为平衡、尊重、团结及制衡。在不同的时期,这四种策略的结合方式不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美国、印度、东盟及其国内反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对比。

【关键词】 外交政策;越南;中越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2)06-0142-05

【作者简介】 梅记周(1976—),男,江西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越南社会主义研究。

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越南对中国的发展极为敏感。长时间处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之下,越南因而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作为地处中国同东南亚要塞的国家,越南直接与中国接壤。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东盟地区的热点国家之一。然而,学界对越南的对华政策^①较少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就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及演化轨迹进行论说。

一、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内容可概括为“平衡”、“尊重”、“团结”和“制衡”。

(一)平衡

越南的“平衡外交”是一种多方面、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该政策避免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为依据,追求全面发展与它国的平等关系,并尽量与各国保持相对等距离的外交思维。革新开放后,越南“平衡外交”的核心是大国平衡外交。面对来自中国这一强大邻国的“威胁”,越南积极发展与世界上主要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全面平衡关系,并尽量维持大国力量在越南的整体平衡。^②

平衡外交是越南外交的基本政策。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把对国际力量分析列为研究国际关系六大分析方法之一。^③在一些越南外交决策者的著作中,平衡外交处于显著的地位。前外交部长阮基石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世界主要国际力量的平衡、结盟、大国关系等。^④前总理武文

杰在一篇文章中暗示平衡仍然是越南外交政策的默认战略。^⑤在任职期间,武文杰经常提醒政府官员,说越南处于“龙”和“虎”包围的地区,国家的落后是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⑥

(二)尊重

越南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附属国,中越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所以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尊重的政策居主要地位。^⑦在现代,越南的政治精英依然采用传统的尊重政策来处理对华关系。越南人常说,在军事上抵制中国,而在外交上应尊重中国,这体现了越南对华关系的双重特征。前越共总书记黎可漂的私人秘书说:“越南采取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大国相比邻,不能长期同中国处于紧张状态。”^⑧

(三)团结

冷战期间,团结是越南外交的主要策略。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越南把“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团结的对象。^⑨“第三世界”的支持是越南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越南同样希望得到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越共首席理论家阮德平曾在一次中越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⑩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将仍然是越南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时首选的团结对象。

(四)制衡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日益

密切。这种趋势造就了国家外交的敏感性,经济制衡应运而生。经济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也反映到越南的对华政策上:除了采取同大国进行军事合作平衡中国力量的传统做法外,亦希望在经贸、资源等方面积极寻求利益共同点,同时发展与中国的“纠葛”的“朋友”的合作关系,抑制中国的“崛起”,制衡中国。

武文杰在1995年8月8日给政治局的信中曾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来自全球利益的多样性和多极化。”^⑩他认为越南在谋求国际地位时,不应盲目依赖某个大国,而应广交朋友,密切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为竞争对手制造新“麻烦”来制衡他们。此种观点在越南具有代表性。

二、越南对华政策的演进

冷战后,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并不是简单使用上述某一项政策,而是综合运用。在不同时期因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对华政策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一)保卫社会主义时期(1990—1991年):“尊重”+“团结”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越南国内自由主义思潮泛起,并导致“陈春柏事件”的发生。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越共领导人有意同意识形态相似的中国结盟。

越南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主动向中国示好并在外交上表现出尊重,除意识形态因素外,越南国内经济及其国际地位变化也是原因之一。首先,经互会国家对越南直接经济援助越来越少,双方贸易往来要求以硬通货结算,这对长期依赖经互会的越南经济是沉重的打击。其次,入侵柬埔寨的历史导致东盟及西欧国家对越南心存疑虑,使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地位难以改变。越南对外开放之路困难重重,越共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关系。这一时期,越南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为在尊重中国的基础上,团结中国保卫越南社会主义。

(二)重返地区事务时期(1991—1998年):“制衡”+“平衡”+“团结”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中越关系的坚冰被打破,越南同东盟关系好转。前总理武文杰对印尼、泰国和新加坡这三个主要东盟国家的访问,开启了越南同邻国交往的新篇章。1992年3月,越共理论刊物《共产主义》刊发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题为“越南在亚太地区的趋势”一文,认为越南应该把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作为外交战略的首选。越

南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和平、独立和发达国家的值得信赖的伙伴。^⑪这预示着越南将重新定位其地缘政治。1992年7月,越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多元化、多边化外交方针的决定。^⑫强调越南已经处于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应把发展同地区合作和同大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⑬是月,越南加入巴厘协定,成为东盟的观察员。1998年1月,越南正式成为APEC的成员国。这标志着越南成功重返地区事务当中。

对于越南来说,参与地区合作意味着对中国制衡的可能。越南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就此说:“中越两国的关系将会在更大的联系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网络中共存。任何想侵犯越南主权的国家也将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⑭

越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周边关系,通过了保卫祖国安全的政策决议,^⑮认为越南应同其他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把同越南建交的国家按照亲疏进行排位:中国、古巴、朝鲜、老挝和柬埔寨是越南最亲密的朋友,而美国是越南最大的敌人;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东南亚其他国家列为第三位;上述以外的国家排在第四位。

(三)面向未来时期(1998—2003年):“尊重”+“团结”+“平衡”

1997年12月新任越共总书记黎可漂上台后,越南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越发表了稳定双边关系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⑯在黎可漂倡议下,中越双方同意定期举行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会议。在2000年的首次会议上,越南首席理论家阮德平建议中国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总的来说,黎可漂时代越南制衡中国政策的地位有所下降,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才是对手,因而倾向于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2001年4月越共九大上,农德孟当选为总书记,并未改变越南的对华政策。是年底,农德孟访问中国并发表中越联合声明,试图促进中越关系重返胡志明时代的“同志加兄弟”。

越南民族主义者则试图通过加强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2001年,同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为越南融入世界经济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与俄罗斯也缔结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四)积极融入全球时期(2003年至今):“平衡”+“尊重”+“制衡”

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使越南对其

外交战略评估不得不做改变。很多高层领导人在战前认为美国不会单方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其他大国的反应没有越南预期的强烈,萨达姆下台也比它预想的快。《共产主义》的作者们开始认为:“从长远来看,世界是处于多极化当中,但是不得不承认,此刻的世界是由美国主导的准单级的世界。”^⑩

2003年7月,越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实用主义成为越南外交政策的基本策略: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以他国对待越南的态度来判断友敌,以确定是采取合作还是斗争的策略。同年,越南分别同日本和印度建立了可靠的伙伴关系和战略深度的合作关系。

越南和美国密切往来,并不意味着它会牺牲同其他国家的交往投向美国。越南安排了同主要大国一系列的高层访问。总理潘文凯2005年第一次访问美国后,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国家主席陈德良先后访问法国和中国。由此可见,越南在借用大国平衡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依然保持尊重。

2008年以来,在中越南海问题的争议当中,越南引入美国、印度、东盟有关国家,意图平衡在南海的力量,牵制中国,谋求更多的利益。

三、影响越南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

(一)国内两大阵营的力量

越南对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国内反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两股力量的对比。在面对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借助越南人权、民族等问题进行“和平演变”时,反帝国主义者在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上表现出忧心忡忡,倾向于尊重和团结中国,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经济上落后于周边地区是目前越南的最大危险,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倾向于用平衡和制衡的策略处理对华关系,把中国拖入复杂的多边利益中,阻止中国的“崛起”。

(二)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因素

中越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关系。首先,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共同点。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从高层到地方都要考虑到这一点。第二,两国关系历史悠久,情感复杂。两国关系中,很有可能再现百年来曾经出现过的不愉快事件。第三,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端,是双边关系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第四,两国之间的关系属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种不平衡关系对制定和落实政策的思维产生愈益重要的影响。中国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强大,虽然越南也在发展,但两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越南对中国是“既爱又恨,

既希望又害怕”。^⑪

从意识形态层面考虑,越共希望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依托其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从发展经济层面讲,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越南在传统优势产业上可积极挺进。但是,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市场份额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由此又不希望中国强大。一方面,面对具有相似意识形态和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越南方面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的逐渐转移,越南希冀在全球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制衡中国。

(三)无处不在的美国因素

美国是越南处理对华关系时绕不开的因素。同美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会增强越南的国际地位,加快其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美国也是越南国家现代化所需人才培养的潜在教育来源。越南也意图通过同美国合作来平衡、制衡中国。越南外交家陈光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在与一个大国交涉时,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一是找另外一个大国与之平衡,二是联合本地区的其他小国”。^⑫

对美国而言,从经济利益讲,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政治稳定的越南是美国商品出口的潜在市场。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不希望崛起的中国在东盟及亚太地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威胁。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希望通过密切接触使越南人民接受美国的“民主”,进而走向“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因此,越南一方面希望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合作抵制美国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和美国的合作来平衡、制衡中国。

(四)极力“东向”的印度因素

2003年,越印双方提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设想,并签署《印越开展全面合作的联合宣言》,明确了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教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越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有着一定的基础:首先,传统的友谊。两国人民在殖民地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次,相同的经历。越南和印度都与中国因领土纠纷发生过战争。复次,共同的“朋友”——美国。随着南海问题凸显,美国战略“东移”,三方在琢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时,关系将会拉近。最后,共同的“威胁”。越南和印度担心崛起的中国进入南海和印度洋。

在此基础上,两国一方面积极推进贸易合作,同是新兴经济体,越印有很多扩大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战略安全的考虑,越南支持印度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也支持越南竞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双方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得以开展。在对华政策上,印度是不可小觑的因素,越南将利用其来对中国实行平衡和制衡。

(五)有所作为的东盟

东盟成立 30 多年来,日益发展为该地区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合作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南加入东盟,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其战略意义,一方面,东盟为越南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提供了平台。越南借助东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外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面对其他地区和周边大国的崛起挑战,东盟也迫切希望通过组织扩大来提高影响力,而越南是本地区与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面对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心态复杂。经济上,东盟与中国的贸易连年增长,东盟中较发达的国家对华贸易的总额和顺差不断增大,新东盟成员国享有中方给予的许多优惠。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提升了东盟在国际上尤其是东亚事务中的地位 and 影响。^④但是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敏感的地区争议,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台海问题仍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在经贸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竞争。此外,成员国的华人政策、历史问题、文化隔阂以及资源与环境问题,对东盟的对华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将会利用东盟来平衡中国。

综上所述,影响越南外交政策的外部因素来自中国、美国、印度、东盟等。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会从美国、印度等大国寻求帮助,联合东盟的力量来平衡、制衡中国。中国的态度也同样影响着越南对华政策。

结论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并不是被一种政策所指导,也不是从一种政策简单地转向另一种政策,而是由团结、尊重、平衡和制衡混合组成。

演进历史证实越南对华政策的显著变化。虽然越南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相同的,但没有一种政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国内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主要包括:中国、美国、东盟以及越南国内两大集团。越南的对华策略将继续集平衡、尊重、制衡为一体,具体谁占显著地位则依然会取决于中国、美国、印度、东盟因素及越南国内两大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注 释

① 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史学的角度,对中越关系进行历史时

段的划分,主要包括对中越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描述,如李谷、古小松、潘金娥等;论中越关系,如黄真、黎氏秋红等。

- ②⑩ [越]黄惠英:《在大国间寻求平衡——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华和对美外交》,国际关系学院 2009 年学位论文,第 26、115 页。
- ③ [越]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科书》,政治理论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8 页。
- ④ [越]阮基石:《世界过去五十年(1945—1995)和将来二十五年(1995—2020)》,国家政治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2 页。
- ⑤ [越]阮基石:《20 年革新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报告的建议》,见: http://www.ykien.net/tl_viettrung90.html。
- ⑥ [美]艾伦·E·古德曼:《1994 年的越南:和平在即》,载于《亚洲调查》1995 年第 35 期。
- ⑦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和越南:不对称的政治》,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0 页。
- ⑧ [越]阮志忠:《越共九大前二十世纪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见: <http://www.ykien.net/clbdt011.html>。
- ⑨ [英]唐纳德·H·麦克迈林:《国际安全的亚洲视角》,麦克米莱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7-76 页。
- ⑩ [越]阮德平:《对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些思考》,载于《共产主义》2000 年第 13 期。
- ⑪ [越]武文杰:《致政治局的信》,载于《论坛》1996 年第 48 期。
- ⑫ [越]丁儒廉:《越南在亚太地区的趋势》,载于《共产主义》1992 年第 3 期。
- ⑬ [越]杜梅:《当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载于《共产主义》1992 年第 8 期。
- ⑭ [越]闵哈:《世界形势与我们的外交政策》,载于《共产主义》1994 年第 12 期。
- ⑮ [美]卡莱·A·泰尔:《中越关系》,载于《亚洲调查》1994 年第 34 期。
- ⑯ [越]《越南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文件》,国家政治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5 页。
- ⑰ 十六字方针的表达上,中国和越南有些许不同。越南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放在首位。
- ⑱ [越]陈霸科:《伊拉克战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于《共产主义》2003 年第 20 期。
- ⑲ 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42-143 页。
- ⑳ 贺圣达:《东盟对华政策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赵长峰]